

风雅之士钱锺书与杨绛

5月25日是杨绛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。四年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离世时,人们纷纷感怀于一个时代的落幕,也宽慰于“我们仨”的天上重逢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伉俪,钱锺书、杨绛并驾齐驱的才学和相濡以沫的爱情都久久为世人传颂。斯人已逝,但他们以风雅和幽默点亮平淡灰暗,将世俗生活过出诗意的文人风神,依然令人怀想。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说:“整个二十世纪,中国文学再没有一对像钱杨这样,才华高而作品精,晚年同享盛誉的夫妻了。”



1

风雨同舟63年

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望族之后,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,才子佳人一见倾心,喜结连理。1935年钱锺书考上“庚款”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,年轻夫妻同住伦敦求学。二人笃志虚心读书,天璧非宝,寸阴是竞,更有爱情相伴。“缣眼容光忆见初,蔷薇新瓣浸醍醐。不知腼洗儿时面,曾取红花和雪无。”

钱锺书两年后获副博士学位,又至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。夫妻携幼女归国时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便赴云南执教于西南联大,国难当头,以教书育人报国。

1949年钱锺书又回清华大学任教授,杨绛则执教于北京



1935年,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。

大学。1952年二人调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,钱杨成为寥寥几个研究员中的两席。1953年文代会之后,钱锺书突然被调去翻译《毛泽东选集》,这可是极荣耀的工作,只有领导认为极可靠之人,才有此殊荣。钱锺书是个认真严谨之人,发现书中毛主席说“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”,显然当是“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”之误,毛主席欣然接受。

翻译《毛选》之后,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钱锺书,又被派到古代组“选注宋诗”。钱锺书出版的《宋诗选注》,获得很高声誉。

杨绛也是才高八斗的人物,在钱锺书的《围城》横空出世之前,便在1941年后,相继创作出剧本《称心如意》(四幕喜剧)、《弄真成假》(五幕喜剧)和《游戏人间》等,翹楚剧坛。著名学者李健吾当时著文说:我将欢喜地指出,杨绛是中国喜剧里程碑式的剧作家。她的喜剧,善于在各尽其妙

的人物刻画中,隐喻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之滋味,而且有对中西文化历史的双向审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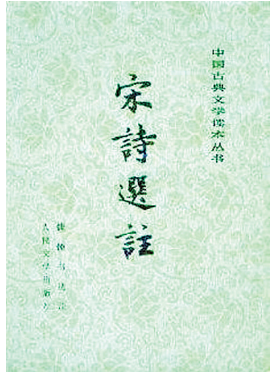
杨绛不仅写喜剧,还精于翻译,有《堂·吉珂德》《吉尔·布拉斯》等多部译著出版,她的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《将饮茶》《我们仨》等构思奇巧、想象大胆、寓意深厚、文笔洒脱,既折射出现实人生,又表现出作家的“艺术勇气”而脍炙人口。

钱锺书夸赞杨绛是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”,说:“我见到她之前,从未想要结婚。我娶了她几十年,从未后悔娶她,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。”杨绛幸福地说:“我也一样。”晚年,杨绛出版《我们仨》,写钱锺书、杨绛和他们的爱女钱瑗之间的爱,那么深沉又朴实,读之令人动容。

钱锺书的隐忍是智慧,杨绛的快人快语也是以智慧为依托的,一柔一刚,刚柔并济,构成一种和谐的处世哲学,彰显人格力量和人性魅力。他们夫妻极高的文化修养、纯粹的至性至情,让他们活得快活洒脱和长寿,夫活到88米寿,妻活到105岁接近茶寿。看淡世事沧桑,内心安然无恙者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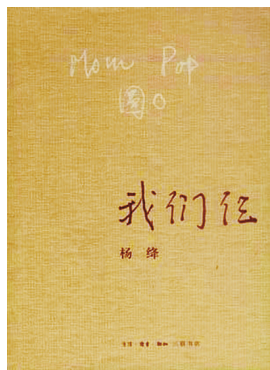
《围城》1980年版,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印。



钱锺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初版于1958年。



杨绛译《堂·吉珂德》,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网格式。



《我们仨》于2003年出版。

2

“文化昆仑”的传世之作

钱锺书的名头很大,有人称之为“文化昆仑”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、学者余英时说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“最后一个风雅之士”。

钱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的,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,西方的文学典籍无不涉猎,对西方哲学、历史也烂熟于心。他受书香门第家学的熏陶,20岁已走上博雅考订道路,国学功底深厚,其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之造诣,人们只能望其项背。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时,浩博宽豁之通儒钱穆先生,早年作《国学概论》一书,曾请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执教、名满学界的父亲钱基博教授作序,结果钱锺书执笔代作。钱穆读到署名“钱基博”之序,深为其宏观的史实与气

度折服,遂在《自序》向“子泉宗老(钱基博)”致谢。后杨绛披露,此序系钱锺书代笔,“一字未易”。钱锺书时年20岁,学界震惊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钱先生的《马克思传——一九三四年我所爱的书》一文发在林语堂主编的《人间世》半月刊上,引人注目。接着他出版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等,但真正给他带来极大荣耀的是1946年完稿、次年初版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。尽管内战烽火已起,上海经济萧条,但《围城》很畅销。

钱锺书译完《毛选》,回到文学研究所后,外国文学组没有收留他,所长郑振铎对杨绛说:“默存(钱锺书)回来,就借调古代组选注宋诗吧。”此非

钱先生所愿,但他听任安排。他以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,下苦功夫搜辑辨认,遍读宋诗,两个寒暑中“晨书暝写细评论,诗律伤严敢市恩”,最终出版《宋诗选注》。

原本是个冷僻僻,经钱先生一选一注,竟惊艳学界。胡乔木说:“选注精当,有独到之处,是一部难得的版本。”一衣带水的日本学界汉学泰斗、宋诗专家吉川幸次郎对《宋诗选注》非常重视,推崇备至,交口称誉说:“由于此书的出现,宋代文学很多部分恐须改写。”

钱锺书在学术上善于独立思考,从不“明道”,也不“救世”,更不做“媚时”学问,给中国文化留下一束独立精神的薪火。

3

将世俗生活过出诗意

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拨乱反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全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,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,其中就包括《围城》。胡乔木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,说《围城》《清宫秘史》都应考虑出版。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去钱府商量《围城》出版事宜。

《围城》于1947年初版后,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重版过两次,读者争相阅读,成为当时文坛热门话题。那之后《围城》无端被视为“反动小说”,一禁就是30年。

听到《围城》拟出版,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极为吃惊。他波澜不惊地说:“那个旧东西,不要再出了。”钱先生的表态,与许多作家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作品的热切之情相比,反差如此之大,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禀性有关。经过劝说,他总算同意重版,却明确表示:“以前的东西,原样为好。”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,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,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,存一个“真实”。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尚真实的精神之所在。

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“规矩”,钱的书,书名由杨绛写,杨的书,由钱写。钱锺书很在意“锺”字,他说:“贱名‘锺’字,皆改为‘钟’,虽无关系,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为资料,复原如何?”字体简化后,“锺”与“鐘”皆简化为“钟”,但两字是有区别的:钟,计时之器;锺,感情集中也。很多人忽视二字之不同,钱先生特别强调,维护自己的署名权,理应得到尊重。

《围城》再版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,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开启。《围城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版,首印13万册,供不应求,盗版者也乘虚而入。同名电视剧开播后,万人空巷,图书印数更是暴涨。

钱先生家客厅不大却典雅整洁,玻璃书柜占满两面墙,另一面墙的字画下有两个单人沙发,靠窗下有一张书桌,摆放正校阅的书稿。客人到访,钱先生总是从里屋搬木椅,独自坐了,让客人坐沙发。

钱先生不善热闹,独爱清静,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,一直未改。余英时先生说“除了才高和勤学之外,受前清遗老像陈衍那样的人影响很深”,是位淡泊洒脱的文人。能把人间烟火世俗生活过出诗意来,这是文人的最高境界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